

我對蔣介石研究的思考與探索

〔日本〕鹿錫俊

一、蔣介石研究與抗日戰爭研究的互補關係

回顧 1937 ~ 1945 年間中日兩國的內政與外交，必須注意到雙方在政治體制與決策過程方面的一個重大差別：在日本，雖然其基層政治層面組織嚴密、國民團結，但在中央政治上則是天皇、政府與軍部的多元體制，而且其首相頻繁更迭，整體上始終缺乏一個具有極大威信、在關鍵時刻可以左右大政方針根本方向的核心人物。而當時的中國則與日本形成鮮明對照：雖然基層政治層面組織渙散，且一直存在著國共兩黨的對立，但在國民政府的中央政治層面，蔣介石一直處於最高領導人的地位，並始終在內政外交的政策決定過程中發揮著左右國策方向的關鍵作用，以致日本在這一時期往往把其對華政策稱為對蔣政策。因此，不研究蔣介石，就無法真正認識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內政外交的性質和政策決定過程的特色。

另外，國外學界一般認為，蔣介石在抗日戰爭時期的作為，既是他人生中最輝煌的功績，又是他最終喪失政權敗退台灣的遠因。因此，不研究抗日戰爭的歷史，也就不能真正理解蔣介石。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作為人物研究的蔣介石研究和作為專題史研究的抗日戰爭研究，是一種相輔相成的互補關係。

二、官方檔案的局限與蔣介石日記的價值

這兩個領域的研究在過去很長一個時期主要只能依據官方檔案進行，因此，它們所展示的大多是蔣介石與抗日戰爭的一些表層特點，而無法深入蔣介石的內心，通過揭示其在決定大政方針時的心路歷程，來展現抗日戰爭時期中國政治、軍事與外交的深層原因。

2006 年後，這種狀況有了很大改善。其主要原因，是從那一年起，人們得以使用暫存於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蔣介石的日記手稿，來彌補過去在資料條件上的缺陷。當然，關於蔣介石日記的學術價值，學界有各種看法，譬如，質疑其是否和一般的名人日記一樣，記好不記壞，以免日後有損本人名譽。還有人擔心，經過蔣介石的親屬對日記原文的遮掩後，人們是否還能讀到原汁原味的內容，等等。筆者認為，對於蔣介石從 1915 年至 1972 年的全部日記，不應一概而論，而應該區別不同時期作出分析和評價。而就與抗日戰爭直接有關的 1930 ~ 1940 年代的蔣介石日記來說，除了記有每天公私兩面的主要活動外，更有對國內外形勢的觀察和關於政策方針的思考，以及處理重大問題時內心的糾結，其中不乏有損蔣介石本人形象的內容，因此其私密性不容置疑。至於蔣介石親屬對日記的遮掩，也僅限於涉及個人隱私之處，由於採取的是塗黑方式，還可看出被遮蓋的文字極少，並不影響讀者了解日記的原貌。正因如此，1930 ~ 1940 年代的蔣介石日記

對於蔣介石研究及抗日戰爭研究的重大學術價值，目前已經得到明確的肯定。

三、蔣介石日記使用上的不足之處

問題是，自蔣介石日記開放後，雖然湧現出很多令人矚目的新成果，但在日記的使用方法方面也隨之出現了一些突出的不足之處。概言之，有以下五點：

第一，在論著中直接引用蔣介石日記，應該和它們的原文相同；用外語翻譯蔣介石日記，應該和它們的原意相符。這些都是做學問的基本常識。但是，由於蔣介石日記尚未公開出版所造成的使用上的客觀困難，也由於日記使用者個人的主觀原因，我們看到，一些論著所引用的蔣介石日記不夠正確，特別是外語論著中所翻譯的蔣介石日記，有些並不符合日記的原意，甚至和原意有很大出入。

第二，運用蔣介石日記，本來應以充分理解日記所述內容的歷史背景及內在的邏輯為前提，但目前的一些論著對此前提重視不足。有些引用不顧前後脈絡，斷章取義；還有一些論著不是從精讀日記中得出論點或結論，而是先有了論點和結論，再從蔣介石日記中找出片言只語充當根據。

第三，近年在大陸和港台都出版了大量民國要人的日記，特別是王世杰日記、徐永昌日記、胡適日記和翁文灝日記等等，都可以很容易地找到。這使研究者可以對同一天所發生的事情，用不同人物的日記進行相互對照。如此，既可彌補各自的漏記、誤記或故意的迴避，又可從不同人物的特殊視角對歷史事實作多面考察和多重比較。同時，把這些私人文書和官方的檔案相互對照，還可從公、私兩個角度對歷史進行立體的考察。如此，既可充實論據，加強論證，又可防止誤讀與誤判。近年來，這兩個方面的相互對照，都已有入著力實施，但就整體來看，還只是剛剛開始，日後還有很大的發展餘地。

第四，像蔣介石這樣跨越戰前、戰時、戰後，長期身處政界頂峰的領袖人物的日記，僅讀其中幾個星期或幾個月的內容，很難把握其歷史脈絡及內在邏輯。譬如，如果要考察蔣介石對盧溝橋事變的反應，僅看盧溝橋事變發生當時蔣介石的日記是不夠的。只有結合閱讀盧溝橋事變爆發以前的蔣介石日記，從中釐清他在事變之前的認識，再結合閱讀盧溝橋事變處理完畢以後的蔣介石日記，從中找出他的事後反思和反省，才能得出一個比較全面的結論。因此，研究者只有在耐心讀完一個較長時期的日記，掌握其對某一個案之發展過程的完整記錄後，才能真正充分發掘出蔣介石日記內含的全部價值。易言之，在耐心讀完一個較長時期的蔣介石日記之前，應該克服“即使零零碎碎也先用了再說”的急躁情緒。

第五，這些年來海內外各家史料機構已經出版或開放閱覽了有關蔣介石與抗日戰爭的大量歷史檔案，以此為基礎，關於蔣介石和抗日戰爭的研究，也已有深厚的積累。因此，目前對蔣介石日記的使用，更多的不是發現完全未知的事物，而是探索既知事物中有待發掘的深層真相，通過深入蔣介石的內心，而深化我們對歷史本質的認識。但目前有一種傾向是只注重從蔣介石日記中發現未知，而輕視從蔣介石日記中開拓對既知事物的深層考察。

四、抗戰史研究方法上的三個問題

接下來談一談抗戰史研究方法上的三個問題。

首先，中日關係是在相互作用中變化的，因此，關於中國的考察，不能脫離對日本的研究。反之亦然。更進一步來說，中日關係是在世界形勢和國際政治的大環境中展開的，故影響中日問

題的因素，並不限於中日兩國，還存在於第三方。特別是在抗戰時期，中國對日本和對美、英、德、蘇等第三國的外交政策既緊密聯繫又內含矛盾，形成一個多重交叉、錯綜複雜的複合體。而蔣介石作為國民政府的最高領導人，一直處於各種矛盾的中心，在深刻的糾結中作出困難的抉擇。因此，要研究中國的抗日外交，必須以蔣介石為切入點，就其與日、美、英、德、蘇等國之間的作用和反作用進行綜合性的考察。但是，長期以來，關於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外交的研究，有的是只談中國，不及日本；有的是只談雙邊關係，而割裂了雙邊關係與多邊關係的互動，因而顧此失彼。

其次，即使僅限於 1937～1941 年間即中國單獨抗戰時期來看，也有一系列國際性的重大歷史事件。如：1937 年的德國調停，1938 年的日本東亞新秩序聲明，1939 年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與歐洲戰爭爆發，1940 年的國際援華物資運輸通道的關閉與日德義三國軍事同盟的建立，1941 年的日蘇中立條約與德蘇戰爭、日美交涉等等。它們都具有歷史轉折點的意義。因此，對這些歷史事件作個案研究，從中究明蔣介石對它們的因應過程，並剖析其背景、影響以及和其他事件的因果關係，將進一步深化對抗日戰爭史全貌的認識。但目前此類個案研究尚不多見。

最後，從 1920 年代至 1940 年代，如何認識和處理國際秩序問題，一直是中日關係中的一個重大課題。按照日語詞典的解釋，所謂“秩序”包括兩個含義：其一為使社會保持理想狀態的規則與原理；其二是實現這些規則與原理的方法與戰略。按照這樣的定義來研究中日兩國在秩序問題上的對立，就既要看到雙方圍繞規則與原理（包括條約等）問題的分歧，又要重視雙方在戰略問題上的較量。但是，在既有的研究中，關於戰略問題的實證性考察還不多。

五、筆者的探索

鑑於上述反省，筆者自蔣介石日記開放以來，首先一直提醒自己努力避免及克服蔣介石日記使用方法上的前述缺陷。為此，在“耐心通讀”方面，筆者數次訪問胡佛研究所，累計共用了 15 個月的時間來閱讀蔣介石日記手稿，並反復校對自己的抄本。在蔣介石日記與其他要人日記的互相對照方面，筆者特別致力於和徐永昌、王世杰、張嘉璈、胡適、陳布雷等人所遺日記的比較。在公私文書的互相對照上，除了重視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和台北國史館、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的檔案外，近年還注意收集斯坦福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和美國國會圖書館等海外機構珍藏的相關檔案。在對照公私文書的具體作業中，則特別留意以下四點：（1）私人日記中有，官方檔案中無。（2）官方檔案中有，私人日記中無。（3）官方檔案與私人日記對同一問題的不同描述。（4）被刻意隱蔽的判斷、認識與動機、意圖。

同時，在抗日戰爭史的研究方法方面，基於本文第四節所述的認識，筆者近年比較重視對前面提到的那些重大事件的個案研究，並以研究中國與研究日本的結合、研究中日雙邊關係與研究多邊關係的結合為努力的目標，力求立體性地再現蔣介石⇔中國⇔中日雙邊關係⇔世界多邊關係的多重互動。

作為這些努力的階段性成果，筆者嘗試了以下五個個案研究：

（1）蔣介石對 1939 年 8 月蘇德互不侵犯條約與翌月歐戰爆發的因應。如何應對這兩個重大事件，涉及到對德蘇關係、德日關係、日蘇關係的判斷與決策，因而是對蔣介石的一個嚴峻考驗。筆者通過這一個案研究而發表的論文，初步揭示了蔣介石“把中日問題和歐洲問題、世界問題聯為一體同時解決”的外交戰略的背景，以及他在面臨多國外交重大關頭時的心理狀態。

（2）蔣介石對 1940 年夏季國際危機的因應。從 1940 年 6 月法國降德開始，經 7 月法英兩

國先後封閉中國抗日物資的主要通道，中國的抗日戰爭遭遇到為期 3 個多月的極其嚴重的國際危機。其時，國際形勢變幻莫測，歐戰與中國的抗戰，前景都似乎是黑暗壓倒光明。在這個背景下，圍繞對德路線，國民政府內部出現了三種意見：孫科主張脫離英美，親蘇聯德；王世杰主張繼續對英美一邊倒；蔣介石則主張在加強美蘇關係、維持英法關係的前提下爭取改善中德關係。蔣介石後來認為，他在危機時刻作出的這些抉擇特別是制止孫科的主張，是他在 1940 年作出的最成功的決定。

(3) 蔣介石對 1940 年 9 月日德義三國結成軍事同盟的因應。這一事件是國民政府度過前述國際危機，迎來國際形勢好轉的重要契機。因此，當時國民政府的主流意見是中國應該斷絕與德義兩國的聯繫，徹底與英美結盟。但蔣介石卻一反常態，決定對兩大陣營持不偏不倚的中立態度。這一個案展現了蔣介石採取這種被批判為“灰色態度”的方針的動機和效果。

(4) 蔣介石對 1941 年 6 月德蘇開戰的因應。隨著德蘇戰爭的爆發，圍繞中國抗戰的內外形勢再次發生巨變。筆者的論文通過研究蔣介石在這個案例上的政策決定過程，釐清了他 1939 年 9 月後對德蘇關係的發展趨勢的判斷，以及對德蘇戰爭的方針。

(5) 蔣介石對 1941 年日美談判及日美開戰的因應。1941 年，日本和美國的談判從半官半民提升到政府層級，其過程充滿曲折，並最終走向開戰。日美對立的焦點之一，是如何處理中國問題。因此，日美談判與中國抗日外交的成敗緊密相關。蔣介石是何時開始得到日美談判的消息的？其內容的精確度如何？他就此在對美和對日關係上採取了哪些措施，其作用如何？筆者通過論文提示了對這些問題的見解。

以上述個案研究為基礎，筆者於 2016 年 2 月以日語出版了題為《蔣介石的國際解決戰略：從蔣介石日記看中日戰爭的深層》的專著。目前，筆者正著手於該書中文版的出版準備。

作者簡介：鹿錫俊，日本大東文化大學國際關係學部教授。

[責任編輯 陳志雄]